

高法成. 2024. 南海渔民生计脆弱性的内生问题——基于广东碓洲岛的田野调查. 热带地理, 44 (2): 248-257.

Gao Facheng. 2024. Endogenous Problem of Fishermen's Livelihood in South China Sea: Based on Field Work of Naozhou Island in Guangdong. *Tropical Geography*, 44 (2): 248-257.

南海渔民生计脆弱性的内生问题 ——基于广东碓洲岛的田野调查

高法成

(广东海洋大学 法政学院, 广东 湛江 524088)

摘要: 使用田野工作法, 调查了广东碓洲岛渔民生计脆弱性的内生问题。研究发现, 渔民因海洋生态保护所遭遇的已经显露的生活困境, 或许能在政府的扶持下有所改善, 但那些更多的隐性风险——内部竞争、社会保障、文化适应等生计, 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 渔民生产工具的投入、自身的技能、年龄与身份的模糊性, 构成其内生的生计脆弱性, 在现代消费市场的刺激下容易对海洋资源造成破坏性作用。基于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 渔民生计的脆弱性内生于生产力快速提高导致的其自身技能未进行更迭, 未能建立适应生产力需求的新的生产关系, 因而造成人海关系的紧张。要解决渔民生计的脆弱性内生问题, 需从渔民的文化特殊性出发, 由内而外地改革渔民的生产关系, 更新渔民的技能、建立有效的组织, 逐步缓解人海关系的紧张状态, 以实现人类—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关键词: 海洋生态保护; 渔民生计; 脆弱性; 中国南海; 碓洲岛

中图分类号: F32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5221(2024)02-0248-10

DOI: 10.13284/j.cnki.rddl.003768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 人类与海洋的关系更加密切, 人类与海洋的相互影响越来越突出。一方面, 海洋广泛而深刻地影响和制约着人类的生产生活, 对人类的衣食住行各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 人类也以其生产生活方式不断影响甚至改变着海洋, 最终制约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目前, 中国海洋生态环境正面临严峻的形势, 诸如海洋污染严重、资源过度开发、鱼类品种严重退化、渔业生产粗放式增长等都在危害海洋经济的持续发展。与此同时, 城镇化建设、各类海洋工程建设以及海洋划界和伏季休渔制度等也使得传统渔区和渔民生计发生显著变化, 渔民作业区域范围大幅缩小, 渔船数目和捕鱼产量不断下降, 渔民生计生活受到很大冲击^①。为了改善近海渔业资源持续恶化的趋势, 保

障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近些年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应对政策和措施, 进行转产转业安排, 探索“养殖+电商”的创新经营, 但渔民失去了传统社会生活的基础却是被忽略的现实, 渔民上岸后的社会环境也面临巨大压力, 如渔区公共基础设施落后, 渔区城镇化程度低, 渔区的教育、文化、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事业与城市差距拉大, 甚至不如临近的农业村镇。

最近几年, 随着柴油、劳动力价格上涨, 渔民生产成本快速上升, 一些船主亏本经营甚至折价卖船, 从而背上沉重债务, 生活陷入赤贫。在渔业体制从集体合作制向股份合作制转变过程中, 多数渔民选择放弃股份, 股份结构从全员持股变成少数人持股, 大部分渔民沦为没有生产资料的雇工, 股东

收稿日期: 2023-05-23; **修回日期:** 2023-08-22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海洋生态保护政策下的南海渔民可持续生计研究”(21YJA840006); 2021年度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创新类项目“海洋生态保护和伏季休渔双重作用下的广东渔民可持续生计研究”(2021WTSCX037)

作者简介: 高法成(1976—), 男, 山东聊城人, 博士, 副教授, 主要从事应用社会科学研究, (E-mail) 187105795@qq.com。

^①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2021年全国水产品捕捞产量为1 295.89万t, 同比下降2.18%; 2021年年末全国渔船总数为52.08万艘, 比上年减少4.2417万艘, 同比下降8.14%; 2021年渔业人口为1 634.24万人, 同比下降5.03%, 其中传统渔民比上年减少38.28万, 同比下降6.89%。这些下降趋势在未来还将继续(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等, 2022)。

渔民与雇工渔民之间的年收入相差悬殊。此外，港口、通讯等沿海工业的快速发展，大量围海造地工程也侵占了渔民传统作业渔场。随着渔民受到的限制越多，生产空间日益狭窄，其生计陷入“要地没地、要海没海”的境地，尽管政府相关部门积极开拓渠道，帮助“失海”渔民转产上岸，但由于多数渔民年龄偏大、就业技能单一，脱离渔业生产后就就业困难，生计艰辛。渔民因海洋生态保护所遭遇的已经显露的生活困境，或许能在政府的扶持下有所改善，但那些更多的隐性风险——社会保障、文化适应等生计，均与陆地社会中的农民有着“鸿沟”般的差别。当前研究基本没有考虑到渔民在海洋生态保护下，各种隐性社会风险的不断增加，也忽视了渔民在国民保障体系中的先天不足问题。

面对如上困境，阎祥东（2020）指出要改变沿海渔民的传统作业方式，提高沿海渔村收入，对渔民进行精准扶贫不仅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也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但如何即能注意到渔民固有的生计和惯习，引导渔民在利益、尤其在独占鱼获的巨大诱惑面前不铤而走险，不以违法手段获取暴利，又能扭转生态保护对渔民当前生计产生的“挤出效应”，构建可持续生计，需立足于中国本土实践，开展渔民生计问题的跨学科研究，进而实现渔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这也是至关重要的国家海洋战略课题。向海而生既是海洋渔民的历史使命，也是他们生计的必然选择，在当前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感召下，中国渔民既要承担这一走向未来的时代课题，“造大船，闯深海，捕大鱼”，将个人命运与海洋休戚与共，也要向海洋宣示主权，成为在海洋上游弋的主人。然而，当下中国渔民生计具体呈现什么特点？渔民生计脆弱性的内生因素有哪些？这在既有研究中还没有得到足够关注，而这也正是本研究的出发点。

1 文献回顾与方法

为严格控制捕捞强度，有效养护和合理利用渔业资源，中国政府采取了5项措施：1）严格执行渔业捕捞许可和渔船管理制度；2）严格实施禁渔期、禁渔区制度；3）积极落实减船转产转业政策；4）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5）积极开展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活动。随着国家对江河湖海生态治理的深入，渔民传统的生计方式受到严格限制，守法守则

与违法违规的矛盾在渔民生活中随时呈现。而政府对渔民“失海”“失业”的安排，看似有具体的操作规范，但实质上并没有解决渔民面临的预期的经济损失，尤其是在未来要面临的生计影响。

渔业是一个高度的资源依赖型产业，许多研究者都关注到渔民生计受气候变化、鱼类资源减少的影响而捕捞生产下降，显示渔民生计脆弱性的一面。如李磊（2018）通过研究北江水域环境资源变化对渔民生计的影响，认为渔民群体本身对水域资源的高度依附性使其捕捞生产活动具有较大的脆弱性，生计依赖于水域资源，但其捕捞行为本身对水域资源造成影响，而流域内鱼类捕捞数量的变化又会影响到其生计。同时，水利设施的建设也是影响渔民生计的重要因素，流域内水坝的修建阻碍鱼类洄游，并且不定期放水蓄水也加大了渔民捕捞难度及修理渔网的成本，这与陈杰（2015）对于东江流域内水利设施建设阻碍鱼类洄游，使渔业资源减少的结论有高度的一致性。国外学者 Mulyasari 等（2021）使用生计脆弱性指数（the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Index，简称为“LVI”）评估生计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得出气候变化导致的鱼类产量下降必然会降低渔民的收入水平，从而增加其生计脆弱性。Makwinja 等（2021）通过对非洲马隆贝湖沿岸渔民的生计研究，认为生计脆弱性高低与渔民在湖中可捕捞的鱼类数量有关，当地渔民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来自于暴雨、大风、干旱、湖泥增加等气候变化所导致的渔业资源减少，并破坏当地渔民生计的可持续性。但如何有效解决这类问题，并没有给出较好的答案。Nunan（2010）通过对东非第二大淡水湖维多利亚湖沿岸渔民生计研究发现，渔民在沿湖登陆点之间来回移动，以应对鱼类资源在局部区域减少的问题，渔民还利用社交网络确定更好的渔场和鱼价较高的地区。由于捕捞量减少和收入减少而造成的脆弱性虽然通过流动得到缓解，但这些脆弱性的来源变成风险性行为 and 捕鱼压力增加引起的脆弱性。此外，江河湖海的一体性启示，局部的短缺事实上是总体短缺的反映，自然资源总量下降的事实并不会随着渔民转化作业区域而得到解决，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增殖放流的做法对鱼类资源恢复的有限性。相关研究集中在自然资源、渔民作业方式等外在因素，探讨渔民生计的脆弱性，揭示渔民生计艰难的资源性影响，却忽视了渔民内生的脆

弱性——靠海吃海的传统与难以有效组织起来的集体生产，以及生产工具的巨大投入带来的投机行为。

自然难以“依靠”，是否可以依靠他人？渔民生计的稳定性是否如耕地农民一样可以依赖其社会资本的扩展和金融资本的投入而得到支持？安招（2015）通过对渔民的社会资本进行量化研究指出，亲属关系在渔民社会关系网络中占据绝对的比重，而渔民社会网络成员的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政治面貌、职业类型、单位所有制都存在很大的趋同性，这导致渔民的社会资本难以支持其生计的有效扩张。王华（2021）就渔民的社会资本研究进一步指出，渔民长期在海上漂泊，与内陆居民形成相对的隔离，加之渔民身份常被陆地社会想象性的构建、污名化和排斥，从而限制了渔民社会关系网络的扩展，进一步限制了社会资本为渔民提供帮助的可能。纪齐等（2022）使用定量模型 Logit 分析创业培训、企业招聘和安置房政策对于长江流域的渔民社会交往密切程度的影响，发现以上政策均能显著促进渔民社会交往，但这其实是一种瞬时显著，一来渔民本就缺少相应的支持，一定给予会引起较显著的变化；二来这些变化并不持久，也无法形成代际传递。在对渔民管理和政策方面，岑家峰（2012）通过对桂江流域渔民的生计研究提出，行政系统对渔民的管理仅限于业务方面，由于缺乏专项的管理经费及对渔民生产生活熟悉程度较低，加之渔民群体在城市中不被视为属于弱势群体，因而缺乏有关渔民保障的具体政策措施。在国外，相关研究同样显示，渔民生计无法获得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有效支持。如 Schrank 等（2005）通过研究芬兰禁渔 10 年对渔民生计的影响，认为禁渔后的渔民主要收入是通过国家和社会保障制度提供的，渔场工人的总收入非常低，失业率逐年增加。Colwell 和 Axelrod（2017）对休渔期渔民收入的研究指出，休渔政策对于下层阶级生计状况的负面影响最大，而拥有额外生产性家庭资产的上层阶级面对禁渔令反而可以从中获利，后者被动应对的可能性远小于前者。

如何解决渔民生计的问题？学者多以典型个案的方式，进行人海关系、资源管理、策略改进等方面的探讨。如王利兵（2021）通过对谭门渔民的人海关系研究提出，海洋与渔民之间应该是一种适应

和依赖关系，人们通过劳动将二者进行连接，渔民既收获了海洋知识和经验，也创造了许多用以适应海洋的思想、文化和制度，在何种程度上实现海洋与渔民之间和谐统一的人海关系值得重视。唐国建（2019）通过对小链岛自然资本变动对渔民生计影响的研究，认为面对自然资本内生性变动时，需强化已有自然资源的管理，以谋求渔民生计可持续，当自然资本外生性变动时，需寻找可替代的自然资源以维持生计。针对如何改进渔民生计策略，国外相关研究指出，渔民参与相关政策制定在其中起重要作用。如 Garza-Gil 等（2020）对加西利亚小规模渔业部门的研究发现，当地渔民有较强的参与海洋政策的制定过程的意愿，希望通过渔民协会就区域、国家政府实施的与渔民相关的管制措施发表意见，以更好地维护渔民群体的利益。Alves 等（2021）认为伯利兹沿海地区渔民和渔业管理的参与方具有多中心、嵌套性和分散性的特征，将决策权分配给地方社区一级机构，有利于渔民在面对海洋冲击对生计造成影响时保持弹性。Halik 等（2020）通过研究社会形态对于渔民生计策略的选择性影响，发现在托拉尼渔民社区的生产方式可以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着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2 种生产方式形成不同的收入结果，成为生计策略选择的基础。

总体而言，渔民生计脆弱性问题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为认识和理解渔民生计与人海关系提供了参考和依据，但也存在一定的脱离实际和不深入。其中，国内学者的研究较为偏重自然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政策及管理某单一角度对渔民生计脆弱性的影响，缺乏对渔民生计的整体研究，对生计脆弱性关注不够深入；国外学者的研究受意识形态以及渔民作为社会底层这一认知的影响，偏向于探讨政策对渔民的影响及渔民通过自身行动如何影响政策，过于强调渔民的分散性与流动性是其生计脆弱性的根源，尽管开发了各种计算工具衡量渔民生计的脆弱性程度，却未能洞察到渔民在生产关系中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更多地将生计脆弱性归结于外在影响，掩盖了渔民生计脆弱性内生性问题。

鉴于此，本研究基于田野调查方法，利用受客观因素影响，渔民返岛又不出海作业的聚集时段，

从2020年7月到2023年2月, 不断到硃洲岛进行调研, 较集中时间有两段一个月以上, 先后走访了南港、北港、孟港、潭北4个村委会, 红卫和津前2个居委会。同时到硃洲岛农业、渔政、海洋航标站等管理部门进行访谈, 到访硃洲旅游协会、各处神庙等。选取重点渔民村社, 如津前社区、红卫社区、梁屋村、黄屋村、潭北湾村、后角村、烟楼村、斗龙村、西埠村、晏庭村、大浪村、叮当村、赤马村、下马村、宋皇村等, 参与渔民生产、生活, 体验村集体活动, 选取重点人群20多人进行结构或半结构式访谈, 访谈内容涉及渔民的出海作业、日常生活、家庭收入支出、村民行动等方面。调查对象涉及各类渔民、船员、外来作业者, 也包括部分农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下村帮扶干部、谙熟当地文化的教育者, 接触上百群众, 与十几位渔民建立了长期的友谊, 从而构建本研究的“在场”事实, 通过各类访谈资料、田野日志的整理与分析, 试图探讨南海渔民生计脆弱性的内生问题。以期构建渔民可持续生计, 推动人海关系良性发展贡献实践价值。

2 南海渔民生计脆弱性状况

本研究案例为广东硃洲岛, 硃洲岛是位于湛江市东南逾40 km处的一座离岛, 岛屿面积56 km², 行政上隶属湛江市麻章区硃洲镇, 下辖8个村(居)委会, 103个自然村, 常住人口约5万人。硃洲岛四面环海, 与大陆之间没有连接的桥梁, 渡轮是连接岛屿与陆地的唯一方式, 由于岛上没有公交车等公共交通设施, 居民出行以摩托车、三轮车、渔船为主要搭乘工具。环岛边缘沿海地区呈扁平的条形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渔村, 解放前疍家人曾在岛屿南端搭建过大量小木棚居住, 俗称“离水三尺白鸽笼”, 解放后政府沿岸边划定区域供渔民上岸建混合结构楼房居住。目前, 硃洲岛的渔民以海洋捕捞业和养殖业为生, 小船在沿岛近海从事钓鱼、刺网和拖拽作业, 大船则进行远洋捕捞。岛屿东面因受夏季风影响海面风浪大, 曾经是一个优质天然鲍鱼养殖地, 西南方向位于背风面, 海面较为平静且有大量贝壳聚集, 是一个适合黄花鱼和金鲳鱼养殖的区域。渔村田地多被改造成对虾养殖基塘, 密集分布在岛屿沿岸, 对岛屿土壤和近岸生态造成较大破坏。

硃洲岛曾是解放海南岛战役的渡海点, 岛上渔民当时是重要作战力量, 因此许多老渔民都经历过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 海洋渔业生产归属集体经济, 以渔获换汇支援广东发展建设, 渔民社会地位普遍较高。改革开放后, 硃洲岛周边海洋生态环境渐趋恶化, 尤其是近些年附近海岛进行工业化建设, 对硃洲岛的渔业生产影响明显, 渔获量减少。如今在海洋生态保护政策严管下, 渔民阶层分化迅速, 资本集聚明显。又随着渔民生产成本的快速上升, 渔民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但增收的途径越来越窄, 渔村内的交通往来也不便利, 第二、三产业处于自生发状态, 这些产业基本是围绕服务渔业生产的, 不但难以吸纳因转产转业导致的剩余劳动力, 反而令自身的生存举步维艰。即使是有些模样的渔业经营实体, 也因为家庭作坊化式的股份经营模式, 其经营方式、管理方式都是以家庭、家族、村落为基础的简单人际关系处理, 无法适应资本运作的市场竞争。

2.1 渔村生计的脆弱: 亲缘关系的合作与竞争

渔村是由渔民组成的共同体, 是依托熟人社会关系网络实现各种资源流通与交换的网络节点, 也是渔民应对海洋捕捞生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的重要资源。渔村规模愈大, 意味着它有更多的人力资源占据更广阔的海域范围, 以获取更多的海洋资源, 继而又将获取的海洋收益投入大型渔船建造和村庄集体基础设施建设中, 以此增强渔村整体实力和个体渔民的竞争力。在这类渔村内部, 渔船以及渔民之间的分工明确, 大型渔船获取的是远洋资源但也面临着更大的风险性, 多渔船联结出海能有效降低海洋风险所带来的损失, 同时也有利于渔船进行合作捕捞以提升渔获量; 小型渔船则是以家庭为单位控制近海海域捕捞, 同时承担着为大型渔船运输生产工具、生活物资和捕捞鱼获转移上岸的重要功能。无论是大型渔船还是小型渔船, 船员都是以家庭或同宗的亲缘关系共结出海, 极少有个人单独出海, 渔民视这种亲缘关系为互助形式。

“村里的人都是兄弟, 请什么吃饭啊, 互相帮忙嘛。”(访谈编号: 625-1-54)

“打电话给好朋友就行的啦, 都会过来帮忙的啦。”(访谈编号: 622-3-62)

合作的另一面是竞争, 这种竞争体现在大型渔船与小型渔船之间的竞争以及渔村集体之间的竞

争,其根本实质上是渔民个人间的资本竞争,最终导致失败者与胜利者差距拉大且难以逆袭。大型渔船与小型渔船竞争体现在大渔船为了节省远洋捕捞成本,违规在近海从事捕捞作业,使现阶段近海渔业资源减少,并挤压小型渔船的近海捕捞空间,近海可供小型渔船捕捞的海洋生物,由过去的经济鱼类向虾蟹等壳类动物转变,小船渔民利益受损明显。

“现在海边都抓不到什么鱼了,三四年前网放下去就是一网鱼,现在一网下去有时候都是空的,油钱都亏了。”(访谈编号:625-1-54)

“我们也不是怕这些大船,只是他们一过来就把我们的网也拖走了,这让人怎么活。”(访谈编号:625-1-52)

大小渔船之间的竞争传递到村集体层面则是占有大型渔船多的渔村能更多更有效率地获取海洋资源,并以此形成渔村内部的渔业捕捞链条,而占有大型渔船较少或是没有大型渔船的村庄则只能默默忍受近海渔业资源减少造成的生活困窘,海洋产权的公共属性所产生的制度成本被渔村竞争中的失败者所承担,村庄之间差距随着海洋捕捞趋于兼并化而逐渐扩大。

2.2 渔民生计的脆弱:做海的逃离与回归

做海是硃洲岛渔民对下海捕捞作业的俗称,是他们最基本的生计方式。前些年,许多年轻人选择外出务工并在城市中定居生活,留在岛上的“常住人口”普遍为四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伴随各种生态保护政策的规范和约束,这些中老年渔民进行赶海活动的空间越来越小,能力也大不如前,许多人成为被时代抛弃的“不中用的人”。他们越来越怀念以前的日子,尤其是在计划经济年代吃着“皇粮”的岁月。

“粮啊,一成立渔业生产大队的时候就有了,刚开始每人每月32斤,后面慢慢每月40还是42斤我不记得了。”(访谈编号:902-2-82)

在硃洲岛,渔民房屋以2层楼以上的混凝土砖石小洋楼为主,以现在物价水平计算造价在40万元以上,建造房屋费用由渔民劳动积累资金和亲戚借款2个部分组成,“就像你们买房一样,一点一点还钱咯”。一位五十岁的渔民,小学毕业随父亲下海捕鱼,有几十年的捕鱼经验,家里共有六口人,夫妇两口加一位老父亲和两个儿子,目前两个儿子在外打工。夫妇两人的主要生计是出海捕鱼,家里有

一大一小两条渔船,小船4 m,大船12 m,每年捕鱼收入有10万元左右,去除燃油费用、渔网修补和渔船维修等成本,每年净收入6万元左右。岛民生活物资普遍匮乏,日常家用皆需从外面购买,每月生活费用2 000~3 000元,“硃洲岛啥都比外面贵,有钱就多用一点,没钱的时候就少用一点。”(访谈编号:623-1-21)

年轻渔民选择逃离多半是因为捕捞渔民生计的艰难。鱼群行踪的不稳定性使得船员必须随时处于一种工作状态,待技术员发令而进行收放笼具作业;进行远洋捕捞作业时,较长的出海时间与封闭的船体空间容易使人产生寂寞与厌倦感,有限的娱乐方式又使得渔民情绪缺少必要的发泄途径,身体和精神上的艰苦让“子承父业”越来越难以实现。

“海上抓鱼很辛苦的,太阳又晒,一个浪打过来就全拍脸上了,还得天天都出去抓鱼,有时候空网油钱都亏了。”(访谈编号:621-1-52)

“留在村里能有什么前途,在海上晒的黑乎乎的,哪个女孩子会喜欢你啊。”(访谈编号:622-1-54)

“在船上有时候也挺无聊的,先下好电影电视剧在船上看,看完了就反反复复看,船靠岸了就把电影电视剧删了。”(访谈编号:622-4-34)

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外出务工收入大幅减少,不少年轻人又返回岛上,既带来外面的新想法——开个民宿,扩展收入,还不用放弃年轻人的娱乐;也回归到传统的捕捞作业,从小就会干的活儿,岛上游客不多,干旅游不耽误做海。事实上渔民自己并不认为外出打工能有多高的收入。“一年收入与小船年净收入是相当的”“你必须要有技术进工厂才有高工资,否则就得自己做点买卖,才比出海赚钱”。当外出务工赚到的钱远低于捕鱼收入时,年轻人会选择回到渔村从事捕鱼工作,而这个工资临界值一般在一个月5 000元,“一个月四千五千的,自己花都不够用,那还不如回来捕鱼”。看着年轻人回来,岛上一时又活跃起来,但零散的游客、缩减的海产,年轻人折腾几个月后,又陷入难以持续发展的困境中。

3 渔民生计脆弱性的内生问题

相比较近海生态破坏、海洋灾害频繁和南海争端等影响渔民生计的外部环境,硃洲岛渔民生计

脆弱性呈现更多的内生问题——在既有外部条件一定的情况下, 渔民因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相一致, 引致依靠渔民自身无法克服的生计脆弱问题, 其中生产工具与人力资本成为是渔民生计脆弱性内生的核心问题, 这种局面又导致渔民不得不采取许多与法律法规相违背的行动, 以此获得自身生计的最大机会成本。依据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论述, 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会对生产关系产生影响, 生产关系的矛盾和斗争则会影响生产力的发展, 并着重强调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否则生产力的发展会受限甚至停滞不前。南海渔民经历小木船转向玻璃钢船的巨大生产力变化, 提高了战胜自然的能力, 但在生产中忽视了对自身能力的改造, 依靠传统的渔获知识和现代气象技术, 提高了捕捞能力, 增加了渔获, 却带来生态的灾难, 造成一个虚高的“野生”概念, 又反过来促使他们更进一步加大了对海洋的过度捕捞力度。而忽视生产关系的改造, 未能建立有效的组织以控制捕捞量, 增强渔民自身技能的拓展与提升, 也未能构建符合生产力发展所需要的新型身份, 最终脱离了社会团体, 成为“边缘”群体。这是渔民生计脆弱性内生的根源, 具体表现在生产力中的生产工具和劳动力、生产关系中劳动者的身份中。

渔民生计脆弱性的内生问题首先表现在生产工具——渔船的高投入, 从购买开始到使用、维修, 最终报废处理, 动辄几百万的投入, 让渔民难以承受退出捕捞作业的损失。渔政总队东海大队东南办事处统计, 目前岛上渔船共有 2 500 多艘, 其中办理《渔民证》及相关合法证件的为 690 艘, 未办理《渔民证》及相关证件的有 1 800 多艘, 这些“三无”渔船以长度 12 m 以下的玻璃钢结构小船居多。但据当地渔民估计, 整个岛上各种无证船已超 4 000 艘。也就是说, 无证渔民已成为岛上最为主要的渔民群体。位于岛屿北端的北港村无证渔船最多, 北港村委会下辖 7 个渔民村, 大的渔民村有 1 200 人, 每个村庄拥有渔船 100 多艘, 小的渔民村有 500~800 人, 每个村庄拥有渔船 50~60 艘不等。在这些渔村中, 依靠传统生计养家糊口的渔民基本上都没有渔民证, 而拥有牌照的渔船也是极少数。为了保护海洋生态, 减少不合理作业船只, 渔政部门早已不再配发马力配额给各个渔村, 村庄原有的配额在十几年前就已用完。而事实上, 渔船马力是

一个伪命题, 在岛屿南端的南港村调研发现, 渔船长度大小与马力没有任何关系, 有些 7 m 长的小船和 12 m 的船马力是一样的, 都是 22 马力的发动机, 马力主要体现的是这艘船能跑多快。另外, 渔船长度、宽度、马力大小都可以自行到村里的造船厂设计, 并没有确定的建造标准。因此, 渔政对渔村马力配额的限制并不能减少渔船的数量, 甚至不具备任何约束力, 只是休渔期三个半月少了每艘船 800 元的政策补贴。

渔船主要以长度进行大小划分, 10 m 以下的渔船算做小型渔船, 主要建造材料为玻璃钢, 制造成本在 8 万左右, 一般在近海进行捕捞作业; 10~15 m 的算中型渔船, 主要建造材料为玻璃钢, 制造成本在 18 万左右, 部分渔船为半木质半玻璃钢构造, 制造成本在 40~60 万, 这类船是可以到海南、广西等地进行远海捕捞的; 20 m 以上的算大型渔船, 主要建造材料为钢, 制造成本 100 万左右, 可以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远洋捕捞作业。15 m 以下中小型渔船出海由 2 个人组成, 一般是夫妻或者父子船, 梁屋村大多数就是这种夫妻船。出海时间一般为 1 天, 早上出海, 下午或者傍晚回到岸上, 这种船并不具有明确的分工, 家人谁空闲了就可以驾驶出海。20 m 以上的大船则由 5~6 个人组成, 除船主外, 其他人都是雇工, 从湖南、广西、江西、贵州、四川等地雇佣而来。大船分工较为明确, 其重要工种是 2 位操作放置蟹笼的人员, 蟹笼的长度能达到 50~60 km, 因此需要熟练的工人操作机器放置蟹笼, 其他成员在船上主要从事捆蟹和其他杂务工作。大船主要捕捞海域在海南和珠海等地区, 海上时间一个星期到一个月不等。

相比较, 小型渔船出海主要是依靠环境、经验和运气, 一次出海运气好遇见大鱼群, 则能获得较为丰厚的收入, 而运气不好甚至可能空网而归。正常情况下, 小型渔业生产每年收入在 6~10 万元, 其中燃油费用是最大开支, 平均每次出海需耗费 80~120 元的油费。由于小型渔船基本为无证生产, 渔民不能享受政府燃油补贴, 这项成本需由渔民自行承担。而大型渔船则可以通过雷达、声呐和导航等先进设备确定鱼群方向并保护船只航行安全, 20 m 以上的钢结构渔船因其具备远洋捕捞能力, 一次出海能获得将近 20 万元的收入, 一年的收入能达到 100 万元, 而每次出海的雇工、燃油、渔船维修和

各项物资消耗等的费用总计5万元左右,出海成本只占收入的25%,即使出海空网而归对于船主而言损失也不算大。

人作为劳动力也可以看作是生产工具,也就有了能否发挥生产作用的限制。即使有了大船有了证,但缺少年轻力壮的船员,一切也无从谈起。于是,年龄、技能、身份、他人行为的影响,让渔民更加难以理性起来。硃洲岛从事捕捞的渔民以中年人为主,也有部分老年人仍进行近海沿岸捕捞作业,对于这些人而言,捕鱼技术是他们能掌握的最重要资本,而对这种技术资本所形成的技术依赖又使得他们缺乏获取其他谋生技能的动力。

“我们生活在这里,没有其他可以做的了,就只能下海抓点鱼”,“这船就是渔民的饭碗。”(访谈编号:621-1-52)

渔民群体年龄偏大的特征使他们很难在外部获得替代性工作,这一现实对他们在休渔期采取的生计策略有重大影响。面对政策性休渔所带来的收入暂时中断,他们的生计策略往往是选择以节流形式延长过去积累资金来应对,而不是通过寻找替代性工作实现开源,当积累资金并不足以支撑他们在这段时间的生计时,便倾向于采取违法捕捞行为以增加自身收入维持生计平衡。原本这种越轨行为是可以通过行政补贴帮助渔民渡过休渔期,然而岛上无证渔民却在这一群体中占大多数,他们无法拿到行政性的休渔期补贴。在渔民认知中,休渔期并不能带来明显且可见的利益,相反还增加了生活压力,海洋的公共属性意味着他人获利增加自身获利就要相对减少,而且对海洋造成影响的成本是由所有人共同承担的。因此,通过对行为所产生的利益与成本之间的衡量及自身所掌握资源的有限性,违规的捕鱼行为对于他们而言无疑是最优选择。

另外,渔民的集体捕捞行为也源于群体身份的模糊性,计划经济时代渔民是作为一种身份进行户口登记管理,渔民群体的存在主要是为满足农业经济需要,是作为种植农业的补充。然而,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渔民户口被取消了,渔民更多被视为一种职业,但这种职业身份又不能完全被确认,甚至还面临着因“双转”政策而被淘汰的风险。无证渔民长期处于被排挤于正式渔民身份之外的灰色地带,不能享受渔民作为一种职业所带来的各项补贴和优惠,却要遵循各种管理制度对于自身捕鱼行

为的约束,并且这种约束所造成的制度成本由渔民个体承担,收益与成本的不对等性使渔民对于现行制度存在质疑。此外,由于市场具有高度依赖性和自身收入不稳定性的特征,致使渔民一旦不能在休渔期前完成生计资金的积累以维持生计,便可能会选择不顾渔民这一身份的限制,进行违法捕捞活动以维持生计平衡。

“还有钱用的时候一般都不会出去,没钱用的时候就去偷偷捞点鱼卖。”(访谈编号:626-2-50)

对于在近海沿岸捕捞作业的有证渔民而言,身份的确认虽然能获得一定的行政补贴,但却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维护,因为其对渔船保险购买和救生设备更新的管理更为严格,同时也增加了对渔船投入的成本,而对渔船部分核心部件的更换通常需要通过一系列申请和审批才能完成。

“你说一部机器有老化陈旧,渔政机关一到船检,就按照当初登记的来检查,科技是向上发展的,第一代机器和第二代机器都有很多不同的。要是第一代机器故障,也没有相应的替换,那台机本身就是落后的,厂家也不生产,改进之后就不一样了,船检时,怎么可能同样色、同样款式。”(访谈编号:830-2-56)

虽然有证渔民的身份能得到确认,也可以得到政府补贴,但实际补贴不能满足生产生计需要,而大量违法捕捞行为又挤占了合法捕捞空间,正常生产作业反而在渔民中成为不理性行为。因此,出于维护生计利益的需要,许多有证渔民往往也会选择性忽视身份限制而加入到违法捕捞行为中,这进一步强化渔民群体对于现行制度的质疑和对抗,并在观念上强化自身行为选择的“正确性”。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发现,以新材料、新技术武装的渔船为代表的生产工具增强了渔民捕捞能力,但这一方面加剧了海洋渔业资源的萎缩,另一方面让渔民卷入出海而无心增加或改变自身技能,以应对更加激烈的竞争。同时,本应适应生产力发展而改革的生产关系却没有适时跟上,渔民因历史经验而积累的渔业资源分布、航行路线的安全与隐秘,弱化了大规模建设渔民社会组织的能力,潜在地加剧了渔民间的竞争,与耕地农民的村级组织、农民合作相比,无论渔村还是渔民间的合作都处于时代的末端。由

此可见，渔民生计脆弱性的根本原因并不只在于资源减少和政策约束，更要关注在生产力发展变化中渔民自身无法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也即无法克服生产的高投入、自身的低技能与身份模糊的脆弱表现，并由此引发的渔民间潜在的无序竞争，这或许是造成人海关系紧张的直接原因。

海洋渔业资源是一种流动性的公共资源，流动性也因此成为海洋社会的一个根本特征，不断塑造着海洋社会内部的组织、结构、经济与观念等文化层面的发展，使海洋社会成为一个不同于农耕社会的人文类型。如，“竞争”作为海洋社会的一个文化特征，其诞生主要与海洋渔业生产以及海洋贸易的高风险性有关，这也是海洋社会的经济生产十分看重以家庭为中心的亲属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这样的竞争文化在现代消费市场的刺激下很容易对海洋资源造成破坏性作用，加速渔民群体间的分化及对抗，并形成内耗，一如碓洲岛上在休渔期，当地渔政等执法部门针对本地的渔船采取严格的管控，但其他海域的渔船如茂名、阳江甚至珠海的一旦出现在碓洲岛海域，相关执法部门却“无能为力”，这让碓洲岛渔民在抱怨的同时加大了偷偷出海的可能性。渔民本在渔民证的“保护”下，显示其归属的特殊及作业的准入性，如今不再增加甚至是逐渐要退出历史舞台的渔民证，让渔民没有了归属感，也让渔民感受到随时可来的“准入性”威胁：只要有资本，带上大船，雇上船长与船员，就可以在熟悉的海域扬帆捕捞，而在他们眼里祖辈传承的海域却因没大船、没船员证等，渔民只能从中偷捕。如果渔民能如耕地农民一样，建立有效的渔村组织，成立类似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海域承包，或许从同样的时代开始，渔民能克服今天的内生性脆弱而走向现代农业所能赋能的新农人之路。

无论是职业还是身份，渔民是不可能消失的社会存在。渔民的生计也必然以海洋为中心，向自然索取生存的资本，发展的资源。渔民与海洋“靠海吃海”的人海关系是不可回避的现实，但海洋生态保护又是渔民不可推卸的责任。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命题，他指出：海洋孕育了生命、联通了世界、促进了发展。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联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共（李学勇等，2019）。“海洋

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完全符合人类历史以来的人海关系发展脉络，海洋对人类并不意味着阻隔，反而是可以让人类进行自由交换的通道，“事实证明，（通过海洋）拉近各大陆人口之间的交流通常比当地贸易活动更有利可图”（Santini, 2017）。海洋是人类命运的组成部分，尤其是海洋渔民赖以生存的家园，守护祖国南大门的南海海域是中国渔民探索海洋、游弋海洋、征服海洋的起点，是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主权之地，今天他们遭遇到生计脆弱性困境，即是他们的命运之旅，也是海洋命运的一部分。以碓洲岛渔民为个案的生计研究，是探讨实现海洋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开端性尝试，事实的发展、国家政策的深入，渔民已经意识到过度捕捞对海洋生态对个人生计的伤害，只是路径依赖的生产习性令他们难以改变具有传承性的生计方式，无论是知识技能还是年龄与资源，都限制了他们参与新型竞争的路径。完全实现“洗脚上岸”意味着当前收益受损，放弃渔民的身份与职业则会深陷无法预知的未来，当下的生计转向对政策与未来的对抗。人海自古一体，而今显示的对抗与冲突意味着需要构建新型的人海关系，既要解决生态资源的紧张，又要促进人海关系的和谐，保障人海再次转向可持续发展，以“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使命，号召全社会关注并帮助海洋渔民，保护渔民的职业与身份，推动发展新型渔民可持续生计迫在眉睫。

总而言之，行至今日的海洋与渔民，在渔业资源不足以与历史相“比较”时，为了保护生态，恢复近海的生息能力，不能只是单向地让渔民退出海洋，近海小规模捕捞渔业仍将继续，向海而生的渔民仍将继续，能让中国海洋主权随时宣示在海上的“小渔船”还是要扬帆，渔民的治理政策需要更多考虑海洋社会的差异性，从渔民自身的文化特殊性出发，由内而外地改善渔民生计脆弱性的内生问题，逐步缓解人海关系的紧张状态，并最终实现人类-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Alves Catherine. 2021. Marine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Fisheries Governance in Belize Exhibit a Polycentric, Decentralized, and Nested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cean and Coastal Management*, 211(10): 105742. <https://doi.org/10.1016/j.ocecoaman.2021.105742>.

- 安招. 2015. 海洋渔民社会资本研究——基于三个渔村的实地调查. 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 [An Zhao. 2015. *A Study on the Social Capital of Fisherman: Based on the Field Survey of the Three Fishing Villages*. Qingdao: China Ocean University.]
- Colwell Julia M Novak and Axelrod Mark. 2017. Socio-Economic Impacts of a Closed Fishing Season on Resource-Dependent Stakeholders in Tamil Nadu, India: Differences in Income and Expenditure Effects by Occupational Group. *Marine Policy*, 77 (3): 182-190.
- 岑家峰. 2012. 困境与出路: 专业捕捞渔民可持续生计研究.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Cen Jiafeng. 2012. *Predicament and Outlet: Research on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of Professional Fishers: Take a Fishing Team in Guangxi Gui River as an Example*. Wuha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 陈杰. 2015. 惠州市渔民生存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 广州: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Chen Jie. 2015. *Investigation and Countermeasure Research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Fishermen Living in Huizhou City*. Guangzhou: Zhongkai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Engineering.]
- Garza-Gil M Dolores, Pérez-Pérez Marcos I, and Fernández-González Raquel. 2020. Governance in Small-scale Fisheries of Galicia (NW Spain): Moving toward Co-Management?. *Ocean and Coastal Management*, 184(2): 105013.
- Halik H A, Salman D, Darma R, Arief A A, and Rahmadanih. 2020. Mode of Production and Sustainability of Torani Fishermen Household Livelihoods in Takalar District. South Sulawesi, Indonesia: IOP Conference Series: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473: 012152. DOI: 10.1088/1755-1315/473/1/012152.
- 纪齐, 杨志豪, 褚嘉欣, 莫媛. 2022. 长江十年禁渔背景下渔民上岸政策对其社会交往的影响分析. *农村经济与科技*, 33 (1): 69-72. [Ji Qi, Yang Zhihao, Chu Jiabin, and Mo Yuan. 2022.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Fishermen's Landing Policy on Their Social Intera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Ten Year Fishing Ban in the Yangtze River. *Rural Economy and Science-Technology*, 33(1): 69-72.]
- 李磊. 2018. 北江水域资源环境变化与渔民生计可持续发展研究. 广州: 华南农业大学. [Li Lei. 2018. *The Study on the Changes of Waters Resources of Environment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ishery Livelihood in Beijiang*. Guangzhou: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 李学勇, 李宜良, 梅世雄. 2019. 习近平: 合力维护海洋和平安宁. 人民日报 (海外版), 2019-04-24 (01). [Li Xueyong, Li Xuanliang, and Mei Shixiong. 2019. Xi Jinping: To Jointly Maintain Ocean Peace and Tranquility. *People's Daily (Overseas Edition)*, 2019-04-24(01).]
- Makwinja Rodgers, Kaunda Emmanuel, Mengistou Seyoum, Alemiew Tena, Njaya Friday, Kosamu Ishmael Bobby Mphangwe, and Kaonga Chikumbusko Chiziwa. 2021. Lake Malombe Fishing Communities'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and Adaptation Strategies. *Current Research in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3): 100055. <https://doi.org/10.1016/j.crsust.2021.100055>.
- Mulyasari G, Irham, Waluyati L R, and Suryantini A. 2021. Understanding and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of Fishermen in the Northern Coastal of Central Java, Indonesia. Bali, Indonesia: IOP Conference Series: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DOI: 10.1088/1755-1315/724/1/012094.
- Nunan Fiona. 2010. Mobility and Fisherfolk Livelihoods on Lake Victoria: Implications for Vulnerability and Risk. *Geoforum*, 41 (5): 776-785.
- 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 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中国水产学会. 2022. 2022 中国渔业统计年鉴.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I-IV. [The Bureau of Fisheries and Fishery Administration,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ational Fisheries Technology Center, and China Society of Fisheries. 2022. *2022 China Fishery Statistical Yearbook*. Beijing: China Agriculture Press, I-IV.]
- Santini Carlotta. 2017. One Sea, One Humanity: Modeling the Man-Sea Relationship in Friedrich Ratzel's Anthropogeographical Project.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of Ideas*, 6 (12): 1-24.
- Schrank William E. 2005. The Newfoundland Fishery: Ten Years after the Moratorium. *Marine Policy*, 29(5): 407-420.
- 唐国建. 2019. 可持续生计视阈下自然资源的变动对渔民生计策略的影响——以福建小链岛为例.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1 (1): 41-53. [Tang Guojian. 2019. Effect of Natural Capital Change on Fisherman's Livelihood Strate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 Case Study of the Xiaolian Island of Fujian. *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21(1): 41-53.]
- 王华. 2021. 数字化时代太湖渔民的身份建构.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38 (5): 40-49. [Wang Hua. 2021. A Study on the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Taihu Fishermen in the Digital Age. *Journal of Hubei Minz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38(5): 40-49.]
- 王利兵. 2021. 潭门渔民生计方式与人-海关系变迁的民族志考察.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48 (5): 107-115. [Wang Libing. 2021. An Ethnographic Study on Tanmen Fisherman's Livelihood and Human-Sea Relationship Changes. *Journal of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48(5): 107-115.]
- 阎祥东. 2020. 沿海渔民、渔业、渔村转型与产业扶贫衔接: 内在联系、困境与实现路径. *中国渔业经济*, 38 (6): 18-27. [Yan Xiangdong. 2020. Linkage of Coastal Fishermen, Fishery, Fishing Village Transformation and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ternal Connections, Dilemma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s. *Chinese Fisheries Economics*, 38(6): 18-27.]

Endogenous Problem of Fishermen's Livelihood in South China Sea: Based on Field Work of Naozhou Island in Guangdong

Gao Facheng

(The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s & Administration of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Zhanjiang of Guangdong Province, Zhanjiang 524088, China)

Abstract: Using fieldwork,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endogenous issues of fishermen's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on Naozhou Island, Guangdong. Existing literature shows that current studies focus on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the resource reduction, climate impact, policy changes, and fishermen's mode of operation to explore the vulnerability of fishermen's livelihoods to reveal the resource-based impacts of fishermen's livelihood difficulties and to explain the impacts of exogenous factors on fishermen's livelihoods. However, to some extent, these studies have neglected fishermen's internal problems and failed to understand fishermen's perspective on whether the improvement of capital can offset fishermen's production inputs and improve their production relations. The study on Naozhou island found that the existing studies have ignored the endogenous problems of the fishermen's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in the era of collective economy, each fisherman's family had a small boat, but the fishermen joined together to work for the "state" on a big boat. Currently, the market economy has ordered this type of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to disappear. Ow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rine fishing operations, everyone must help each other in cases of difficulties when going to sea. In the same boat, the crew members may be immediate or distant family members to avoid malicious harm. However, if production tools require high investment and fishery resources are scarce, cooperation is no longer important. Whoever has more money to purchase large ships has a greater opportunity to control the scarce fishery resources, which is essentially the change in production tools that led to a breakdown in production relations. Although fishermen still talk about traditional relatives' contact, the situation of "As soon as the ship arrives, there is nothing left" has made fishermen realize that competition is the essence of relationships in their fishing villages. Fishermen's mobility, combined with the outflows and reflows created by various realities at the time of the survey, further demonstrates that fishermen, as the labor force, are not ab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market competition of labor factors, nor are they able to get rid of the fishing skills inherited from their parents. They want to leave behind their status as fishermen but have to rely on the status of fishermen for basic labor security. All of these aggregate into endogenous forces, ranging from the inputs of fishermen's production tools and their own skills to the ambiguity of their age and identity. This constitutes an endogenous mechanism for the vulnerability of fishermen's livelihoods, which offers a disincentive effect of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on fishermen's withdrawal from marine production and exacerbates the predatory exploitation of marine resources fueled by modern consumer markets. Consequently, it is difficult to determine the effectiveness of marine ecological protection policies.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based on Marx's theory of Productivity an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the vulnerability of fishermen's livelihoods is inherent in their own insurmountable rapid increase in productivity and their failure to establish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that are adapted to the needs of productivity, which creates tensions in human – sea relations. Therefore, to solve the vulnerability of fishermen's livelihoods, it is necessary to start from the cultural specificities of fishermen, reform their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from the inside out, update their skills, establish effective organizations, and gradually alleviate the tensions in human – sea relations to construct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the ocean.

Keywords: marine ecological protection; fishermen's livelihood; endogenous vulnerability; South China Sea; Naozhou Island